

章宏伟 将故宫学推向世界

■ 记者 田莹

2025年,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之际,章宏伟以一部聚焦动荡时期守护者的《故宫掌门人1925—1949》揭开了尘封往事。今年年初,他又以专著《故宫学十讲》勾勒出故宫学的学术体系。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,他一手推动《故宫日历(书画版)》等文化产品走入大众视野,一手深耕故宫学、明清史、古籍文献,取得了累累硕果。读书、考据、著述、治学,是他生活的常态。聊起故宫,他的眼神里全是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严肃与较真。

以文献为钥匙 打开尘封历史

1998年,在出版研究领域深耕多年、颇具声望的章宏伟,调入故宫博物院,任紫禁城出版社(今故宫出版社)社长。虽说长期与典籍、版本、文史研究为伴,早已练就扎实的文献功底,但真正踏入紫禁城,置身于浩瀚的文物与档案之间,依旧让他生出强烈的陌生感与敬畏感。

走进章宏伟的家,更能体会到这份“博大精深”在他生活中的模样。客厅里不见多余的装饰物,沙发与茶几之外,四面墙壁、角角落落都被书架占满,桌上堆着、柜里藏着、窗边码着的全是书。“你看我这一屋子书,其实不过是故宫文化的沧海一粟。”章宏伟望着满墙典籍,轻声感慨,“到了故宫以后,我就开始拼命学,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故宫太厚重、太丰富了,一辈子都学不完。就拿《清明上河图》来说,光这一幅画,我收集的研究著作就有三十多本,可这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随便一件文物、一段历史,想真正弄明白,要学的东西都太多了。”

来故宫之前,章宏伟是出版史、文学学者,研究范畴清晰专注;而故宫不一样,它是明清两代王朝的权力中枢,是上百万件珍贵文物的典藏宝库,更是承载中华数千年文脉的载体。“怎么才能尽快融入故宫、读懂故宫?”他自嘲说,自己既没法像文物专家那样上手品鉴器物、研究馆藏,也做不到如古建筑专家那般深谙木构营造、梁架结构,故宫传统的研究路径并不适合自己。

他试着从大众最感兴趣的图像纹样入手。故宫到处都是龙,他研究起盘踞在宫殿、器物、服饰上的这个祥瑞符号,一头扎进去就是

半年多。但静下心来沉淀后,他意识到:如果研究只停留在纹饰表象、文化符号层面,终究流于浅层,即便再用功,也只能做到二流水准,难触及故宫文脉的内核。“我别无所长,就喜欢看看书、写写东西,跟古籍文献打交道。”思虑再三,他决定回归自己最擅长的领域——古籍版本、历史文献与明清出版史。

在研究清宫旧档、民国报刊、时人日记手稿的过程中,章宏伟发现:有些流传甚久的说法,与原始档案、当事人亲历记载对应不上。这种偏差,触动了他作为出版人的职业敏感,也唤醒了一名文史学者骨子里的求真本性。“做研究我只信奉一句话: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。有多少原始史料,就下多少结论。”他这份恪守史实、死抠材料的治学态度,显得格外“老派”,甚至固执。可恰恰就是这“甘坐冷板凳、肯下笨功夫”的坚守,让他在故宫文献研究、史实考据中找到了走进故宫深处的钥匙。

尽管成绩斐然,他却谦和低调,始终保持清醒;可一旦谈及自己深耕的领域,他又会流露出源于实证、基于史料的笃定与自信。

章宏伟曾牵头故宫藏《嘉兴藏》的影印出版工程。《嘉兴藏》又名《径山藏》《方册藏》,是我国历代汉文刻本大藏经中规模最大、内容最丰富的一部,由明清初民间募资,历时百余年雕造而成。故宫所藏《嘉兴藏》,是海内外现存版本最完整、品相最精良的珍稀善本,文献价值极高。出于文物保护与学术流传的双重考量,故宫决定将这部珍贵典籍系统整理、影印面世。

这项工程之浩繁,远超人想象。章宏伟回忆,当时出版社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全员上阵,周末无休,配合外请的电子公司一页一页拍摄、一卷一卷核对,整整一年半,才完成全部经文的扫描。而这仅仅是第一步。更难的是文献核定,他前后比对过海内外十几部《嘉兴藏》目录,竟没有两部完全一致。也正是在逐卷校勘、穷尽材料的过程中,章宏伟对这部典籍的研究日益深入。

《嘉兴藏》于明万历十七年(1589年)首刻于山西五台山。此前,故宫前辈学者归纳提出:这一时期五台山的刻藏地点有两处——妙德庵与妙喜庵。章宏伟同样以故宫藏《嘉兴藏》每卷末尾的施刻愿文为第一手材料,将一万二千多卷经文复核四遍,确凿证实:五台山时期刻藏地点仅妙德庵一处。所谓“妙喜庵”,实为在一万多卷经文中,仅有一卷将“妙德庵”的“德”字写作异体字“喜”,又因字形与“喜”相近,导致在传抄与著录中逐

渐出现谬误。他以短短数百字将证据链条讲得清晰确凿,文章发表后,得到了学界的认可。

在章宏伟看来,做学问不可靠名气、资历,只能靠原始史料、版本实证、严谨推敲。他不迷信前辈权威,不盲从流行定论,不附和世俗说法,只要史料有矛盾、逻辑有漏洞,就要追根溯源、查证到底。

对普通人来说,故宫的吸引力在于巍峨的宫殿和传奇的文物;但对章宏伟来说,故宫的魅力在于那些藏在宫殿深处、尚未被“清洗”过的档案。这些沉默的故纸,藏着被遮蔽的真相,也藏着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使命。

依据档案还原事件 为故宫掌门人立传

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,在那之前,吴瀛的手稿《故宫尘梦录》被送到出版社,由章宏伟担任责编。作为亲历者,吴瀛笔下的早期院史(1925年—1949年)鲜活而珍贵,也让章宏伟真正沉入那段岁月中。他发现,那段由皇宫向博物院转型的历程,此前少有人系统研究,文字记载模糊零散,甚至存在错漏。

“为什么我要把研究重心放在1925年到1949年?因为那是故宫博物院最艰难,最危险,也最不该被忘记的岁月。”章宏伟说,紫禁城从皇家禁苑走向公共博物院,在战火纷飞、几度濒临解散的绝境里,七位掌门人撑住了这座宫殿的文脉和命脉。

在《故宫掌门人1925—1949》中,他还还原了李煜瀛、庄蕴宽、赵尔巽、江瀚、王士珍、易培基、马衡七人的群像。这七人中,有人甚至未被故宫官方史志收录。像赵尔巽,从1928年起就被故宫视为破坏者,《故宫志》历届领导名录里没有他。但章宏伟在翻阅史料时发现,这位八旬老者在接管故宫遭遇强烈抵制、时局彻底失控后,实在无力支撑,才选择知难而退。“我们不能因为他的‘退’,就抹掉他曾经的担当与尝试。”章宏伟说。

他的书写既有温度,也有锋芒。写开拓者李煜瀛,章宏伟挖出深层动因——早年游学法国,对法国大革命后卢浮宫向公众开放的历程相当熟悉,在心里埋下“把皇宫变成博物院”的种子。“李煜瀛说,‘因系国宝,不宜归一人一姓’,正是这句话,点醒了人们:赶走皇帝,更要守住国宝。”面对备受争议的易培基与“故宫盗案”,章宏伟也没有回避,而是依据档案还原事件始末,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。

这本书并非突击写成,而是沉淀了二十年。章宏伟说自己有个“毛病”,研究铺开面太广,常常一个课题



章宏伟

1964年出生,浙江温州人。历史学博士、研究馆员。主要研究方向为故宫学、中国图书史与明清史。南开大学兼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做着做着就放下,等新材料、新想法来了,再捡起来继续往前走。

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,章宏伟对书中人物的认知也在不断刷新,尤其是马衡。“原来我觉得马衡谨小慎微,好像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但后来我发现,他的重要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的,他以沉默、坚韧的方式守住了故宫的制度、文物与根基。我越来越觉得,马衡和故宫是一体的。”他甚至计划专门为马衡写一部传记,书名可以叫《马衡先生和他的时代》或《马衡先生和他的朋友圈》。

《故宫掌门人1925—1949》于2025年问世后,他的《故宫学十讲》也在今年年初出版。这本看似紧跟推出的新作,实则是章宏伟十余年学术文章的沉淀。还有两部早已约定的书稿,至今仍在打磨。他说:“总觉得自己没做到位,想在能力范围内穷尽所有文献和资料,查到最细、考到最实。只有这样,才能过得了自己心里这一关。为赶时间而仓促落笔,不是我的风格。”

搭建故宫学学术框架 让古建文物“开口说话”

大众关注故宫的红墙古建、百万珍宝,追捧文创与文博科普,却少有人了解,故宫已拥有一门独立、系统的专属学术体系——故宫学。

早期故宫研究“各自为战”:有人专门研究红墙黄瓦的古建,有人专注清点百万件藏品,缺乏整体性、系统性。2003年,郑欣森在南京博物院建院70周年馆长论坛上首次提出“故宫学”概念,打破了故宫研究碎片化、单一化的局面。章宏伟也开始计划打造故宫学的出版基地,他回忆:“我想搭台,为这门新兴学科筑牢传播与出

版的根基,从没想过自己会入局做研究,更没想到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。”

2010年,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学研究所,章宏伟出任所长。从“搭台者”变为“研究者”,他牵头搭建起故宫学的学术框架,邀请高校学者参与进来,让故宫学在大学里落地生根。

此后十余年,故宫学研究所与浙江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合作,联合招收硕博研究生。他们还创办了“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”,每年暑假邀请全国各地高校一线教师来故宫学习,讲习班被教师们戏称为“故宫学的黄埔”。有的教师回去后开设了故宫学通识课,反响很好。章宏伟说:“讲习班已办了13届,来自100多所高校的300多名教师参与其中,影响力甚至辐射到美国、日本的大学。”

故宫学的学术版图不断拓展。2013年,故宫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,以课题项目制吸纳院内外学者参与。2021年,郑欣森牵头的“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”项目结出重要成果: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正式开馆,展示了青铜器、书画等南迁珍品背后的故事,也见证了抗战时期保护中华文脉的伟大壮举。

回望来路,章宏伟感触颇深:“故宫学从没有封闭一隅,而是兼容并蓄、开放共生。”这门年轻的学科,真正做到了立足本土,扎根时代,走向世界,实现着“故宫在中国,故宫学在全世界”的宏大愿景。在他的认知里,故宫学从不局限于考证古代宫廷历史、礼制文物,更涵盖了现代博物馆运营、公共文化传播、文旅融合发展、观众心理学等领域。其终极价值,就是打破历史与当下的壁垒,用严谨的学术研究,让沉默的古建、文物、档案“开口说话”,让紫禁城文脉持续焕发鲜活的生命力。

对话章宏伟

对文物历史心怀敬畏
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

记者:如今故宫是公认的文化“顶流网红”,文创产品、科普短视频层出不穷。在此传播热度之下,您认为故宫文化最不能丢掉的核心是什么?

章宏伟:归根结底两个字:真实。如今故宫文创火爆出圈,这是极好的文化现象。创新的传播方式,让深宫文物与文脉走出殿堂,是顺应时代的有益探索,值得肯定。但是,历史的内核与底线不能松动。网上有不少为博眼球、赚流量刻意杜撰的内容,戏说、歪曲故宫历史,误导大众,消解了故宫厚重的文化底蕴。所以我一直坚守准则:可以用娱乐化的形式传播文化,但绝对不能娱乐化历史本身。

故宫最珍贵的价值,不是流量热度,而是有真实历史印记、有据可考的文物史料与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。无论是治学研究还是文化传播,我都恪守“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”的底线,心怀对文物和历史的敬畏。一旦舍弃真实、丢掉学术底色,再火爆的传播也只是噱头,故宫也会失去独有的历史厚度,变为普通景观。

记者:您长期从事以故宫学为主题的出版工作,您觉得这项工作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?

章宏伟:出版在故宫博物院并不是核心业务部门,但我觉得,其辅助作用是不可或缺的。故宫百万件珍贵文物、海量的宫廷档案深藏于库房,陈列于展馆,受时空限制,大众很难深度接触、完整读懂。出版正是打破壁垒、打通文脉的最佳路径。故宫出版社的出版物不仅聚焦学术,为学者服务,也兼顾大众传播,从《紫禁城》杂志、《故宫日历》到沉浸式数字读物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,我们一直在创新,目的是让学术走出象牙塔,让大众看得懂、买得起。传播亦是最好的保护,通过出版与数字化传播,大众对故宫的热爱与敬畏会不断加深,终将形成主动守护文脉、传承文化的自觉。

记者:您多次提及“故宫人”这个身份,在您和一代代故宫人心中,这个身份的内涵与担当是什么?

章宏伟:外面的人看故宫人,觉得在故宫上班挺风光的。确实,故宫人都有一种自豪感,但其实更多的是敬畏、责任与担当。就拿用电安全来说,我们出版社每间办公室,谁最后一个下班,走之前一定先关灯,然后拉掉房间的电闸,再拉掉总闸。三级断电,既是我们的规定,也是责任。大家甚至都有点儿神经质了,回家路上突然想到电闸是不是没拉掉,就跑回单位,检查后才放心。我们有“四个故宫”建设:平安故宫、学术故宫、数字故宫、活力故宫。平安永远排在第一位。故宫安全无小事,不能有万一,一失全无。紫禁城历经数百年风雨安然无恙,靠的不是运气,而是无数故宫人的严谨与坚守。所谓故宫人,是把这里当家的人,是一群与时光为伴、为文脉值守的人。我们扎根红墙之内,守着文物、守着档案,守着历史。既要以学术严谨还原历史真相,也要以温柔初心传播故宫文化,守护好这座城、传承好这段文脉。

(图片由章宏伟提供)

讲述

亲历者著书记录上合组织天津峰会难忘细节

上合情缘永无终结

口述 王林强 采写 张洁

纪实文学作品集《上合缘——我与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的故事》(以下简称《上合缘》)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,为记录于2025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留下了珍贵文本。该书作者王林强时任峰会新闻中心基础保障项目临时党支部书记、服务保障组组长,他以“文学纪实+理论思考”的双重结构,记录了自己亲历一线的真实故事。

既当建设者 又是记录员

我与上合的深度交汇,确切地说,发生在三年前。2023年,根据工作安排,我前往埃及,到中埃·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调研。这是泰达控股与中非发展基金携手打造的现代化产业新城,是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标志性项目。那段经历对我来说,不是一次简单的出差或采风,而是一次对“国际合作”的认知重塑。

记得从机场到园区的路上一片荒芜,几乎没有像样的基础设施。但进入园区,眼前所见是巨大的反差。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,在起步区和扩展区交界处,矗立着一棵皂荚树,茂

盛的枝叶直冲天际。要知道,苏伊士省极度干燥,年降水量不足10毫米,这棵皂荚树却能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长得粗壮蓬勃。那一刻我意识到,这棵大树不就是“上海精神”生动的写照吗?根系深扎于不同的土壤,枝叶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。

回国后,我写下散文《沙漠中的那棵皂荚树》,礼赞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与中埃友谊。文章经国内主流媒体刊发后,被译成英语、阿拉伯语双语,在埃及十余家主流媒体刊登传播,那种跨越语言的共鸣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“命运共同体”的温度。

埃及之行为我后来参与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埋下了伏笔。一是在情感认知上,我深切体会到国际合作是人与人的靠近,这让我面对中外记者和执行跨国保障任务时,自然怀有一种“把远方故事讲给世界听”的自觉;二是在身份经验上,我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和纪实写作,习惯了既当建设者又当记录员。

当我开始构思《上合缘》,试图寻找一个意象来统领全篇,承载“互信、互利、平等、协商、尊重多样文明、谋求共同发展”这二十字“上海精神”时,脑海里又浮现出那棵皂荚树。我想起那棵远在埃及的树,升华为上合大家庭的精神图腾;它见证了从红海到渤海的精神奔赴,也预示着天津峰会



王林强(右二)与志愿者在上合天津峰会新闻中心。

新闻中心这棵“新树”的茁壮成长。

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新闻中心要容纳3000名中外记者,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个窗口。前期,十三项基础设施提升改造,工期只有100天,六家参建单位交叉施工,任何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我对工程建设的了解仅限于不经意间听过的几个词,接到上级委派,我深感使命光荣,更加肩上的责任重达千钧。

所有人精益求精 让世界看到天津

我换上工装,深入现场。多条线并行施工,让我感受到的不是技术上的难题,而是协同起来比较困难。当项目因协作不畅陷入了僵局,我们党“支部建在连上”的光荣传统闪过我的

脑海。经请示,上级同意我们建立临时党支部。我们打造了以“红心堡垒”“匠心团队”“安心工程”“同心平台”“舒心家园”“暖心工地”为主要内容的“六心工程”,组建工程建设、服务保障、安全应急三支突击队,大家共同努力,最终高效完成了提升改造任务。很多参与工作的同事后来对我说:“知道支部在,我们就有了主心骨,心里觉得特别踏实。”

新闻中心所在展厅顶部管线分布与多个系统的交叉调试,是我压力最大的环节。强电、弱电、消防三条管线并行,桁架的空间有限,原结构与新功能匹配度不高,图纸稍有改动,便会牵动全局。我深知这直接关系到“让世界看见中国精细”的观感,那段时间,我每天习惯性地仰头走在脚手架下,导致犯了颈椎病,脖颈僵硬酸痛。我们的团队以白班夜班倒推、三维建模前置纠错、现场实测实量的方式,一次次地攻坚,最终把头顶的“蜘蛛网”理顺成“秩序网”。

《上合缘》这本书是群像的合辑,党员先锋、产业工人、国际友人,为同一个目标同心协作。泰达水利三分公司的石光玉带领工程建设突击队专攻急难险重任务。有一次拆除旧空调系统,管道井里的灰尘积攒多年,稍微动一动,就会飞舞起来,呛得人喘不上一气。他系好安全绳,带头钻进去。清理完爬上来,早已是满身污垢,咧开嘴一笑,只看到一口白牙。

梅江会展中心广场上的大型主题草雕《合作·共赢》,又被称为“活地球”,整体高达14米,底部拱形花坛直径达36米,占地面积1018平方米,是一件立体园艺杰作。为呈现出这件作品的最佳效果,工作人员顶着烈日摆放花卉,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,身上的衣服浸湿了,又被晒干了,后背

洒出一片片汗渍。

在新闻中心交付前的最后几个小时,一位保洁员趴在地板上,用牙刷一点点刷洗砖缝。她说:“咱天津的‘脸面’不能脏。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——什么是真正的东道主意识。

“精细”这两个字,在我们这里绝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,而是我亲眼盯着、亲手触摸的细节。从图纸上每一处修改的反复验算,到管线排列的毫米级误差,再到新闻发布厅灯光色温的统一校准,任何一个点位,都做到了精益求精。我看到一位同事蹲在地上调试测光仪,总念叨“差一丝一毫都不行”;还有一位同事半蹲在迎客松前捻土轻嗅,因为他对绿化有一种执念:根要扎牢、叶子要够亮,草木的精气神足了,才能迎接五湖四海的宾朋。

“精细”不光体现在硬件上,更存在于人内心的感受里。我多次带着团队走记者动线,用自己的身高、体态去试一试插座的高度、座椅的间距、无障碍扶手的回弹感。连相关人员微笑时嘴角的弧度、指引手势的角度,都在演练场打磨了几千次。世界看见的可能是宏大场面,但“精细”二字,早就融进了我们千百次的练习中。

宏观叙事之外 保留现场温度

《上合缘》这本书中收录了“上合之缘”“上合之树”“上合之光”等十篇文章。这个结构,不是我坐在书房里拍脑袋想出来的,而是在工地深夜的临时办公室,看着窗外新闻中心的灯火一点点亮起来时,自然而然地在我心里长出来的。“十”,代表了完整、圆满,是一棵大树上长出的十根枝杈——从缘起,到树生,逐光而行,依托城市,以心换心,出新破局,笑对多元,彩绘文明,情牵远

近,终归于合。二十字“上海精神”就这样被我安放进具体的现场。

那时我常在三重身份间来回转换。白天是参与者:头戴安全帽开现场会、盯进度;晚上是记录者:回到临时办公室,趁记忆还热,把当天的对话、细节、情绪速记下来;写作阶段是观察者:把自我抽离出来,站在时代与城市的高度去探寻、去追问。写作时我会放下组长的视角,也警惕作家的修辞,而是让文字带我回到现场。参与者给我真实,记录者给我素材,观察者给我意义,三者叠加,才有了那点“汗水味”和“热气”。

有几个瞬间,至今回想起来,仍会让我心头一热。我们的服务保障人员深夜准备物资,一位外国工作人员递上一块巧克力,用中文说“谢谢,辛苦了”;一位哈萨克斯坦记者发来家乡马奶酒的照片,邀我们的志愿者到草原赴宴;被天津美食折服的外国朋友,找我们打听牛肉面的调料包……每一个饱含善意的细节,都是关于担当与温暖的故事。

《上合缘》这本书没有选择宏大的叙事,而是专注于普通建设者、保障者的坚守与奉献,用真实的故事、温暖的笔触,定格了天津担当、中国温度。

天津是一座“依河而生,向海图强”的城市,九河下梢、口岸通商、多元文化交汇,具有开放包容的基因。记录这场盛会,对城市而言,是把一段高光时刻沉淀为集体记忆;对时代而言,则是在宏观叙事之外保留一份来自基层、来自现场的文本。我希望《上合缘》能为天津留下一份档案,让世界看到天津不仅有相声茶馆、美食小吃,更有国际化的服务保障能力和开放包容的胸怀。

我相信:好的写作应当“脚上有泥、纸上有光”。以笔为犁,以心为壤,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大地上,文学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,开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花朵。

(图片由王林强提供)